



SANGLEY 語研究的一種資料 ——彼得·齊瑞諾的『漢西辭典』

高田時雄*

前言

十六世紀末到十七世紀初葉，在西班牙人統治菲律賓的初期，在對當地中國人傳教的過程中，天主教各派的傳教士編纂了記錄他們語言的幾種辭典與語法書。這些以寫本形式保存至今的資料，多數是以拉丁字母標記的，為瞭解約四百年前閩南語的活生生的面貌提供了珍貴的資訊。其中，耶穌會會士彼得·齊瑞諾著有『漢西辭典』，拙文擬對其成書的背景與內容進行簡單的介紹。

一、菲律賓的中國人

以西班牙人來到菲律賓¹為分界線，此前中國商人在菲律賓各地（包括南方的棉蘭老島）同當地居民進行交易，不久就轉而以西班牙人為交易的主要對象。作為殖民地經營者的西班牙人需要消費品，而當地居民未能充分供給，西班牙人依賴中國商人的傾向日趨明顯。中國商人發現這種交易利潤豐厚，開始讓交易船的航行集中到馬尼拉來，不久馬尼拉就形成了福建商人的居留地。儘管如此，多數商人常在交易結束後，就乘船離開馬尼拉回到故鄉，西班牙人稱這種福建商人為 Sangley（複數形式為 Sangleyes）



圖一 Sangley 人的類型從左往右各為教徒、商人、漁夫、搬運夫

* 作者係日本京都大學教授。

¹ 洛佩斯·德·黎牙實比（Miguel López de Legazpi）於 1565 年初抵達宿霧島，以此為開端，1571 年 7 月終於進入馬尼拉，以此為據點的西班牙屬菲律賓宣告成立。

²。但另一方面出現了由於各種各樣的緣故不回故鄉而定居馬尼拉的人，這也是理所當然的，改信天主教的人也逐漸增加。萬曆四十五年（1617）成書的張燮《東西洋考》卷五「呂宋」條中，指出「今華人之販呂宋者，乃販佛郎機者也。華人既多詣呂宋，往往久住不歸，名為壓冬，聚居澗內為生活，漸至數萬，間有削髮長子孫者」，很好地反映了中國人居住在馬尼拉的大體傾向。「澗內」就是西班牙語的 *parián*，1582 年以後馬尼拉的西班牙官廳特意將其指定為中國人居留區。³而「削髮」是指接受洗禮改信天主教者。⁴

中國商人前往馬尼拉，由於 1574 年林鳳（Limahong）襲擊馬尼拉等原因而使中國商人暫時停止前往馬尼拉，但 1580 年以後呈現空前頻繁的局面。當時住在馬尼拉的中國人，大致可劃分為住在被稱為澗內（*Parián*）的地區的商業移民與集中在帕西格河北側的通都（*Tondo*）地區的天主教教徒的農民兩類。⁵



圖二 Sangley 商人的夫妻

萬曆二十一年（1593），在前往摩鹿加的途中，突然發生了總督戈麥斯·佩雷斯·達斯馬林納斯（*Gómez Pérez Dasmariñas*）被中國人船員殺害、船隻被奪取的事件。⁶結果是馬尼拉的西班牙官廳，為了表達抗議之意，將居留區澗內的中國人移到帕西格河北岸的比農德克（*Binondoc*），並將中國人居民的一半驅逐出境。而萬曆三十一年（1603）年末，中國人與西班牙人之間摩擦發展到極點，發生了

西班牙人大量屠殺中國人的慘案。關於其犧牲者的人數，有說多達二萬人的，也有說多達三萬人的。⁷畢竟是受到這個事件影響，一時之間馬尼拉的中國人不見影蹤，但幾年後逐漸出現了恢復的跡象。而且 1610 年以後西班牙官廳向中國人徵收入境許可稅，這筆收入頗豐，反而導致了依賴這種收入的傾向，進一步促使中國人

之間馬尼拉的中國人不見影蹤，但幾年後逐漸出現了恢復的跡象。而且 1610 年以後西班牙官廳向中國人徵收入境許可稅，這筆收入頗豐，反而導致了依賴這種收入的傾向，進一步促使中國人

² 關於 Sangley 的語源有各種說法，至今仍未有明確的結論。舊說中有勞佛與伯希和等的說明，認為其起源於漢語的「生理」、「商旅」。關於這一點，博克塞（C.R.Boxer）在 *South 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London, 1953), 頁.260, note 2 中有簡潔明瞭的說明。至於更詳細的說明，請參看 Y.Z. Chang, *Sangley, the Merchant-Traveller*, *Modern Language Notes*, Vol.52, No.3. (1937), 189~190、淵脇英雄「支那比律賓通商上のサングレイトに就いて」『歴史と地理』第 33 卷第 4 號（1934）。所謂的「博克塞寫本」，將 Sangley 譯為「常來」，不過是音譯而已。詞源暫且不論，Sangley 一詞原是當地的他加祿人稱呼每年為了交易而前來的中國人的詞語，後為西班牙人所沿用，逐漸用以指居住在菲律賓的中國人，這一點可以確認。

³ 關於澗內的創建，詳見箭內健次「馬尼拉的所謂パリアンに就いて」（『台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史學科研究年報』第 5 輯，頁 191~346）的第二章「パリアンの創設と變遷」（211 頁以後）。至於 *parián* 的語源，有墨西哥語起源、當地語言起源等各說，均缺乏說服力，祇能說詞源不明。不過早期作為生絲市場（*arcaiseria*）的同義詞使用，這一點耐人尋味（195 頁）。

⁴ 過去中國人一般都蓄髮，但 1582 年馬尼拉主教薩拉查（*Domingo Salazar*）規定於施行洗禮時，必須剪髮。從那以來，在菲律賓中國人接受洗禮時剪髮就成為慣例。

⁵ 箭內健次「馬尼拉トンド區的支那人發展」『南亞細亞學報』第二輯（1943）。

⁶ 西班牙方面向明朝進行過正式抗議，該事件的始末在中國史料中也有詳細記載。《明史》卷三二二〈呂宋傳〉，《東西洋考》卷五「呂宋」。順便談談達斯馬林納斯之名，在《明史·呂宋傳》中被譯為「郎雷敵里系勝」，在《東西洋考》中被譯為「郎雷氏敵里系勝」，都是相當歪曲的譯法。

⁷ 關於這個事件，《明實錄》卷四百四、萬曆三十二年條中，以引用刑部侍等衙門右侍郎董裕的題本及皇帝對此的批示的形式簡單提到。據此記錄，被屠殺的商人平民多達二萬餘人，或說是三萬人。



高田時雄：SANGLEY 語研究的一種資料——彼得·齊瑞諾的『漢西辭典』

口的增加。以上很簡單地描繪了西班牙人到菲律賓以後的中國人人口的發展。

二、耶穌會的菲律賓傳教

對於住在菲律賓的中國人，天主教的傳教活動是如何展開的呢？天主教在亞洲傳教的四大據點——果阿、馬六甲、澳門、馬尼拉之中，祇有馬尼拉不屬於葡萄牙，而是受西班牙的影響。最初在馬尼拉傳教的是奧斯定會，他們與最早征服菲律賓的黎牙實比一起到達從事傳教活動，因此當然擁有許多既得利益。方濟各會會士亦於 1578 年來島上，準備以馬尼拉為中國傳教的據點。耶穌會會士出現在菲律賓時已是更晚的 1581 年。作為亞洲的傳教基地，馬尼拉可以說是耶穌會發展最晚的地方。到了 1587 年多明我會也派去了傳教士。各個宣教會之間，雖談不上是敵對關係，處於一種的競爭關係之中卻是事實，後來的會派在確保傳教地等問題上不得不面對各種困難。

如上所述，馬尼拉的中國人教徒住在通都地區。從傳教活動開始以來的整個過程來看，委託奧斯定會對他們進行宗教上的管理也是理所當然的。但據馬尼拉大主教薩拉查所言，奧斯定會會士們並不熱心學習中文，對中國人教徒不用中文佈道，而以當地語言（即他家祿語）對付過去。因此中國人教徒對基督教的理解幾乎毫無進展，基本上停留在名義上成為教徒的狀態。⁸然而多明我會於 1587 年到達馬尼拉後，不知是幸運還是不幸，馬尼拉已經沒有適當的傳教地也是一個原因，他們在鄰近澗內的地區設立據點，開始向那裡的 Sangley 人們傳教。翌年建成聖加布里爾（San Gabriel）教會，再次年又建成了同名的醫院。最先學好中文的是貝納比德斯（Miguel de Benavides，貝納比德斯），他在相當程度上可以理解 Sangley 的語言。而高母羨（Juan Cobo）不僅通曉口語也精通文言，以將《明心寶鑑》翻譯成中文而知名。他們也參與了菲律賓的早期出版事業，留下重要的業績。⁹多明我會會士在澗內被移到比農德克後，還繼續從事對中國人的傳教。然而在菲律賓的各個傳道團體本來就將馬尼拉定位為中國傳教的橋頭堡，這種想法非常明確，因此一旦實際開始了對中國人的傳教，傳教士的學習對象也就從閩南語迅速轉變為官話，出現了很大的傾斜。在這個意義上，他們關注閩南語而致力於對其語言進行研究的時期可以說是比較有限的。

雖然比多明我會先到，1581 年耶穌會的桑切斯（Alonso Sanchez, ?~1593）與塞德尼奧（Antonio Sedeño, 1535~1595）抵達馬尼拉，在馬尼拉市以南 1 英里的郊外的拉基奧（Lagyo）建立住院時，對馬尼拉周圍的主要居民的他加祿語使用者傳教之路仍然尚未向他們開啓。以馬尼拉為中心的他加祿地區的南北部，還有使用其他語言的許多居民是傳教的對象，但是不僅他們的居住地遠離馬尼拉，其語言也很不一樣。因此他們當然要向中國人尋求傳教的對象。問題在於語言，在於如何克服以難懂而有名的那種文字的困難。1583 年派來增援的傳教士們，蘇亞雷斯（Hernán Suárez, ?~1586）、普拉特（Ramón Prat, 1557~1605）、阿爾梅里奇（Francesco Almerici, 1557~1601）勇敢

⁸ 馬尼拉大主教 Dimngo de Salazar 於 1590 年致西班牙國王腓力二世的書信。Carta de la China y de los Chinos del Parián de Manila enviada al Rey Felipe II, por Fr. Domingo de Salazar, O.P., desde Manila, á 24 de junio, de 1590. In Retana, *Archivo del bibliófilo filipino*, Tomo 3, 1897; Blair and Robertson, *The Philippine Islands, 1493~1898*, Volume VII, p.168.

⁹ P. van der Loon, The Manila Incunabula and Early Hokkien Studies, Pt.1, *Asia Major*, XII, 1966, 1~43.

地專心研究這個課題。蘇亞雷斯的進步很快，可以在每個禮拜日與節假日用閩南語教中國人教理問答。大主教薩拉查、新總督維拉（Santiago de Vera）¹⁰都對此非常滿意。薩拉查提議將定居中國人社會作為一個教區進行整編，可委託耶穌會予以照顧，維拉也說如果耶穌會接受這一建議的話，可以為他們在市中建住院與教會。但塞德尼奧拒絕了這個提案，因為耶穌會有不干預教區行政的慣例。不過蘇亞雷斯和阿爾梅里奇沒有禁止照顧中國人，他們非正式地持續幫助中國人。在他們的學生中出現了熱心的教徒。蘇亞雷斯還在 1585 年提出的五個項目的提案中，主張在馬尼拉的耶穌會會士都應該學習中文。其目的不僅在於可以在馬尼拉的 Sangley 社會中展開活動，還在於將來中國傳教之路一旦開啓，可以面對這一局面立即做好準備。耶穌會會士們討論了蘇亞雷斯的提案，至少在學習中文的問題上沒有反對意見。這樣菲律賓的耶穌會也出現了在當地進行中文研究的傳統。

三、齊瑞諾的經歷

接下來我們簡單地看看本資料的作者、耶穌會會士齊瑞諾的經歷。¹¹齊瑞諾於 1557 年生於安達盧西亞（Andalucía）的奧蘇納（Osuna），塞維利亞（Sevilla）學習教會法與世俗法。23 歲時加入耶穌會，與阿朗索·桑切斯（Alonso Sanchez）以交替的形式被派到菲律賓。1590 年，與新上任的總督戈麥斯·佩雷斯·達斯馬林納斯同船到達馬尼拉，開始傳教活動。先學他加祿語，在位於馬尼拉以南 14 legua（72.8km）的巴打雁（Batangas）州的巴拉揚（Balayan）擔任臨時的見習傳教士後，奉派管理菲律賓的耶穌會最初的傳教基地太臺（Taytay）與安提波羅（Antipolo）。這兩個地方分別位於馬尼拉以東 24km 及 32km 的他加祿人的城鎮，方濟各會在此進行過傳教活動，因人員不足而被放棄。齊瑞諾平時住在太臺，定期前往安提波羅。齊瑞諾看來用過多明我會於 1593 年以雕版印刷出版的著名的他加祿語的教義問答（Doctrina Christiana）。這個冊子是所謂的馬尼拉搖籃本之一，現在作為海內孤本收藏於華盛頓的國會圖書館，當時被廣泛使用於對中國人的傳教工作。齊瑞諾還被請到班乃（Panay）島的提格巴萬（Tigbauan）傳教。該地居民使用哈拉亞（Haraya）語，是維薩亞（Visaya）方言的一種，與他加祿語大不相同，齊瑞諾需要從頭學習這種語言。齊瑞諾建設教會，管理學校，貢獻很大，由於新上任的年輕傳教士因患瘧疾而喪生，在人員配備方面的不得已的情況下，1595 年 4 月離開此地。這時候菲律賓只剩下 4 名神甫，嚴重的人員不足令人擔心。然而令人驚奇的是，6 月進港的西班牙大型帆船上，不但有 8 名耶穌會會士作為新的戰鬥力乘船而來，而且從羅馬還送來了將菲律賓指定為副教區的文件。塞德尼奧被任命為該副教區的

¹⁰ Vera 於 1584 年就任馬尼拉總督。

¹¹ 此處主要根據 H. de la Costa, S.J., *The Jesuits in the Philippines, 1581-1768*.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並參考了 *The Philippine Islands*, Vol.XII, pp.244~245, 注 31 所見的帕斯特爾斯(Pablo Pastells)所寫的齊瑞諾小傳。據後者所述，作為同時代或時代相近的齊瑞諾傳，有布俄拉斯(Juan de Bueras)於 1636 年 5 月 26 日執筆、輯錄於菲律賓管區的 1634-35 年的《年報者》，尚有維拉德(Pedro Murillo Velarde)發表於 *Historia de la Provincia de Philipinas de la Compañia de Jesus* (Manila, 1749), Part II, Book II, Chap.1 者，遺憾的是這兩者此次均未能利用。布俄拉斯的上述著作收藏於耶穌會的羅馬檔案館 (ARSI Phil 7 I)。



負責人，普拉特成爲馬尼拉學院的院長。來自馬德里的殖民地管轄廳的新的方針也送到了。根據這一方針，菲律賓被劃分爲若干地區，各個宣教會分別負責傳教。對耶穌會來說這些都是理想的進展。他們立即要求獲得萊特（Leyte）島與薩馬（Samar）島作爲新的傳教基地，這得到了批准。以齊瑞諾爲主任，由另外兩位傳教士及一位在俗信徒組成的這一團體，6月中從馬尼拉出發，7月16日早晨到達萊特島的北岸、鄰近卡里加拉（Carigara）城的海岸。他們從那裡徒步前往卡里加拉城。齊瑞諾決定以此作爲一個據點，而後進一步向東、又向南航行，到達東海岸的一個貿易中心杜拉格（Dulag），在研討了各方面的條件後，決定以此爲萊特的第二個據點。萊特的居民說維薩亞方言，不過與班乃的語言略有不同。但在社會組織和信仰方面似乎並無不同。

萊特離馬尼拉實在太遠了，聯繫與來往都很不方便，因此副教區長塞德尼奧考慮將傳教總部移到宿霧，爲立即付諸實施，乃於7月21日到達宿霧。但是塞德尼奧在惡劣天氣中航海而得病，病情時好時壞，終於回天乏術在9月2日去世。齊瑞諾應塞德尼奧的要求，從萊特趕到爲他送終。塞德尼奧持有來自羅馬的指令，即記述其身後人事的未啓封的書信，普拉特據此成爲其後任。其後菲律賓的耶穌會事業繼續順利發展，傳教士的人數也進一步增加了。其間，齊瑞諾作爲負責人一直居住在宿霧。在那裡他們不僅指導西班牙人，而且承擔了當地中國人的教育與教化的任務。1595年，齊瑞諾在該地站穩腳跟之時，中國人地區潤內的人口僅200人左右，規模很小。齊瑞諾在那裡決定開始學習他們說的中國方言。正在此時，繼承父業擔任總督代理的路易斯·佩雷斯·達斯馬林納斯¹²（Luis Pérez Dasmariñas）從馬尼拉送來年輕的中國人教徒，齊瑞諾以此人爲師開始學習，不久就進步到在一一定的輔助之下可以給改信天主教者上課的程度。1596年的五旬節，爲他們施行洗禮，其中包括了當地中國人社會的兩個有權勢的人。其他傳教士中也有效法齊瑞諾學習中文的，他們可以幫助齊瑞諾。1599年在宿霧建設中國人自身的教堂，當地的主教將其委託給耶穌會管理。就在1599年6月，加西亞（Diego García）以視察員身份到達馬尼拉。他帶來了耶穌會總長阿夸維瓦（Claudio Acquaviva, 1543~1615）任命齊瑞諾爲馬尼拉的學院長的文件，於是齊瑞諾就離開宿霧移居馬尼拉。1602年7月7日，齊瑞諾從甲米地（Cavite）的港口出發前往阿卡普爾科，這是爲了作爲副教區的代理前往羅馬。其使命是，在羅馬對耶穌會總長就菲律賓副教區的情況作詳細的口頭說明，請求得到更多的援助，與此同時，迫切希望將菲律賓副教區從墨西哥獨立出來升格爲教區。齊瑞諾於1604年到達羅馬。他熱心地說明，菲律賓的傳教進行得很成功，在資金面也已自立，基本上不需要來自墨西哥的援助，而且可望有進一步的發展，馬尼拉已經具備足以進行充分的教育知識基礎。阿夸維瓦對齊瑞諾的報告很滿意，態度極爲友善，但終究未能立刻承認將菲律賓升格爲教區。儘管如此，其實在齊瑞諾從馬尼拉出發那年（1602）的12月16日已經公布命令，將教區具備的幾乎所有的權限都授予菲律賓副教區。阿夸維瓦還鼓勵齊瑞諾將菲律賓的耶穌會的活動編寫成書並出版，同年出版於羅馬的《菲律賓諸島誌》（*Relación de las Islas Filipinas*）就是此書。齊瑞諾在1606年7月17日回到馬尼拉，1635年9月16日於當地去世。

關於拙文所探討的『漢西辭典』，如下文所述，它於1604年在羅馬被獻給安吉洛·洛卡（Angelo Rocca, 1545~1620），考慮到齊瑞諾從離開宿霧就任馬尼拉的學院長到出發前往羅馬時沒有太多的時間等情況，應可斷定這是從1595年至1599年間齊瑞諾在宿霧承擔當地中國人的教化任務時

¹² 《明史·呂宋傳》及《東西洋考》均譯爲「郎雷猫咨」，與其父的譯名都是相當歪曲的譯法。

的產物。

四、齊瑞諾的『漢西辭典』

這部『漢西辭典』作為“Mss. Fondo Antico 60”收藏於羅馬的安吉利卡圖書館。這是帶羊皮紙封面的八開寫本，共 83 張，正文祇寫在每張紙的正面上。以漢字分 4 行寫滿漢語的詞彙，第 44 頁以後改為 3 行。漢字詞彙的左右兩側，有時在上下方，以拉丁字母標出發音與西班牙語的對譯。在接近最後的部分，不僅有詞語還可看到簡短的例句，許多時候同樣附有發音與西班牙語的對譯，不過有時也缺少對譯。詞語、短句加在一起，集錄項目共有 1021 條。

詞彙的部分似乎根據意義進行了分類，乍一看來給人的印象是與明清時期蒙學課本的「雜字」類相近，不過未發現與本書排列相同的「雜字」。或許該辭典的分類也出於齊瑞諾的中文教師之手，不知不覺中受到「雜字」的影響。需要進一步指出的是，完全看不到有關天主教的任何詞語，這一點也使人容易想像此書並非齊瑞諾本人選擇的，而是出於中國人之手。

漢字是明顯出於中國人之手的楷書，相當熟練。如上所述，有一位年輕教徒擔任齊瑞諾的中文教師，想來這大概也是此人所寫的。另一方面，拉丁字母則是歐洲人的手跡，從下文敘述的獻辭的書體來判斷，可以視為齊瑞諾本人添上的。

翻開這一寫本，開頭綴有致奧斯定會總長的一封信。發信人是尼古拉斯·梅露（Nicolas Melo），1599 年 5 月 24 日寫於波斯的吉蘭（Guilan）。梅露是奧斯定會的神父，作為在莫斯科公國殉教者為人所知。梅露原來出生於葡萄牙的名門，1578 年於墨西哥加入奧斯定會後，前往菲律賓，16 年間從事傳教工作，1597 年，帶著特別的任務，被選派到羅馬去。生於日本、幼年時期跟隨父母前來菲律賓的在俗司祭，尼古拉·德·聖阿古斯丁（Nicolas de San Agustin）與他同行。原因是梅露自己施行洗禮。菲律賓的傳教士前往歐洲時，通常都經由墨西哥的阿卡普爾科，他們卻從馬六甲前往印度的果阿。在那裡沒有找到合適的船，就決定走陸路，與準備在波斯進行傳教的奧斯定會會士一起去波斯。其後兩人進入莫斯科公國的領域，在那裡安慰受到迫害的天主教教徒們，又試圖讓加爾文主義者們改變信仰。因此多次入獄，受到的處罰不計其數。到達接近裏海的尼斯納城（Nisna）¹³時，拒絕改變信仰的聖阿古斯丁終於被斬首，時為 1611 年 11 月。梅露自己也在 1616 年 11 月於阿斯特拉罕被活埋（也有傳聞說是活著被焚身）。俄國王妃巴巴拉·諾斯基（Barbara Noski）也同樣殉教。梅露一行為何從波斯進入莫斯科公國，其行動本來是否重要的使命不得而知。但寄出這封信的吉蘭是波斯面對裏海南岸的地區，從寄信的日期來看，也只知道這是在即將啓程前往莫斯科公國的時候。信的內容祇是關於波斯傳教狀況的報告，未發現特別值得注意之處，因此可以認為這封信被訂入該寫本並無任何特別的理由。可以認為，也許由於某種緣故這封信到了安吉洛·洛卡的手中，因為同是有關東方的資料，齊瑞諾與梅露都是在菲律賓的傳

¹³ 地點不明，可以推測大概在裏海北岸的某個地方。



教士，就將這些都訂在一起而已，彼此沒有任何關係。¹⁴

因此擱下梅露的信來看正文，首先在第一頁可以看到以下的題名與齊瑞諾的獻辭。¹⁵

漢西辭典。這是耶穌會會士彼得·齊瑞諾神父通過與在菲律賓有超過四萬人居民的中國人的會話學到的語言，謹將本書獻給彼得·齊瑞諾本人所尊敬的祭衣室司事猗下。1604年4月30日。
P. 齊瑞諾

祭衣室司事 (Sacrista) 指的是安吉洛·洛卡。他於 1577 年畢業於帕多瓦大學成為神學博士，1579 年任奧斯定會總長秘書，1585 年任梵蒂岡印刷局長，1595 年被任命為教皇禮拜堂的祭衣室司事 (Sacristan, 收納舉行宗教儀式時所需器具等的房間的主管)，因此被稱為「祭衣室司事猗下」。洛卡以奧斯定會的收藏為基礎，於 1604 年開設了圖書館。該館作為義大利最早向普通讀者開放的圖書館而聞名，1609 年為紀念創建人而冠以洛卡的名字，被稱為安吉利卡圖書館 (Biblioteca Angelica)。



圖三 齊瑞諾獻辭

齊瑞諾於 1604 年到達羅馬，估計此後不久他就將自己所編的這部辭典進獻給洛卡。可以認為在該寫本之外，齊瑞諾還另外保存了自己使用的本子，遺憾的是尚未發現。不過法國的國立圖書館收藏了明顯抄自安吉利卡本的一個寫本。¹⁶這是從安吉利卡本刪去漢字而忠實地抄寫了剩下的拉丁字母部分的抄本。抄寫者大概完全不懂漢字，從這個意義上來看該抄本完全沒有單獨存在的價值，祇是偶爾對辨認難懂的文字略有幫助而已。

齊瑞諾的辭典在龍彼得 (Piet van der Loon) 的精心著作中也被提及，¹⁷雖然談到了安吉利卡本的存在，實際上祇不過是根據不完整的法國國立圖書館本對其概要進行解說。因此所談的內容有些含糊，也許他認為安吉利卡本與巴黎本都是沒有漢字的寫本。無論如何，龍彼得對齊瑞諾的辭典所作的論述，¹⁸需要通過對安吉利卡本進行精細的調查加以補充。

¹⁴ 以上關於梅祿的敘述主要根據 Pierre de Charlevoix, *Histoire du Japon*, nouvelle édition, Tome quatrième, Paris, 1754, p.269ff.

¹⁵ 原文如下：Dictionarium Sino-Hispanicum. / Quo P. Petrus Chirino Societatis Jesu linguam Sinensium in Filipinis addiscebatur ad convertendos eos Sinenses qui Filipinas ipsas incolunt et quadraginta millium numerum excedunt. / Quem Rmo. Mons. Sacristae obsequii ergo ipse met Petrus suppliciter obtulit. Prid. Cal. Aprilis 1604. / P. Chirino.

¹⁶ BN, Chinois 9276. 與安吉利卡本相同，全書都是 83 張，祇是最後一頁的下方劃了線，其下尚有兩行，記有「(G.) FINIS / DICTIONARII SINO-HISPANICI +」，這是與安吉利卡本的唯一不同之處，其他各頁則完全沒有出入。

¹⁷ Piet van der Loon, *The Manila Incunabula and Early Hokkien Studies*, Part 2, *Asia Major* XIII, 1967, 98.

¹⁸ Chincheo 的地名早已被使用，有 Chincheu, Chanceo, Chucheo, Chiochiu 等各種拼法。它指的是「漳州」抑或「泉州」，對此有過許多討論。請參看博克塞前揭書，頁 313~326。

五、『漢西辭典』的語言與書寫

正如龍彼得所指出的，這部辭典的重要性不如過去雷慕沙（Jean-Pierre Abel-Rémusat）收藏的 Chincheo 語辭典（Diccionario de la lengua Chincheo）¹⁹當屬事實。據說該辭典是四折本（Quarto）共 436 頁，每頁分爲 2 欄，每欄 24 行，因此無疑是有相當分量的辭典。按拉丁字母排列，區別 5 種聲調加以標記。該辭典在雷慕沙身後傳給儒蓮（Stanislas Julien）、德理文（D’Hervey de Saint Denys），遺憾的是現在下落不明。

關於現在可以看到的 Sangley 語的語言資料，大英圖書館所藏的寫本廣爲人知。²⁰有一種觀點認爲該寫本出於馬丁·德·拉達（Martín de Rada）之手，²¹但考慮到德·拉達的時代與寫本的內容會發現有些勉強。該寫本爲雙面書寫，共有 337 張，首先（1）寫有 Sangley 語的辭典 *Bocabulario de lengua sangleya por los letra de El A.B.C.*（2a-224b），其次（2）「舉行聖禮時須知之事」（Lo que deve saver el ministro para administrar los sacramentos）（225a-238a），（3）「Sangley 語的教義原則」（Principio de la doctrina en sangley）（239a-279a），（4）缺少標題，但類似上記第二點的文本（281a-313a），（5）chiochiu 語文法（*Arte de la lengua chiochiu*）（313-336b），如此連貫而下。龍彼得下的結論是 Add.25317



圖四 辭典本文首葉

是由不同的文本匯集而成的，筆者也認爲大致如此。²²關於其中的（2）、（4），龍彼得將其與馬尼拉搖籃本的一種、漢字本天主教義（*Doctrina Christiana*）進行對比，做了詳細的分析。至於（5）的 chiochiu 語，即 Sangley 語的文法，巴塞羅那大學圖書館所藏寫本似爲原本，而最近出現了該寫本的翻刻。²³

無論 Sangley（Sangley），還是 Chincheo，都是指在菲律賓的福建系中國人，這一點是相同的；

¹⁹ 雷慕沙在“Plan d’ un dictionnaire chinois”（1814）對該辭典進行了介紹、解說。該論文 *Mélanges Asiatiques*, Tome 2 (Paris, 1825), 62~131.

²⁰ 據 BL. Ms. Add. 25317. Van der Loon 前揭論文 Part 2, 99ff. Van der Loon，推測大英圖書館的這個寫本原藏於柏林的皇家圖書館，後爲克拉普羅特（Julius Klaproth）帶走，這是很有可能的。克拉普羅特的藏書，在他身後被拍賣，有不少歸於（當時的）大英博物館。

²¹ 據 Pascale Girard, *Les Religieux occidentaux en Chine à l’ Époque modern* (Lisbonne-Paris, 2000), p.575 所述，見於 Gregorio Santiago Vela, *Ensayo de una Bibliotheca Ibero-americana de la orden de San Agustin*, 1913~25, vol.6, p.451.

²² Van der Loon, Pt.2, 103.

²³ 石崎博志，「翻刻資料 Barcelona 大學藏“Arte de la lengua chin cheu”」，『日本東洋文化論集』（琉球大學法文學部）No.12 (2006), 151~206。石崎氏又將格拉斯哥大學的亨特文庫所藏的拉丁語寫本 *Confectio Liturgiae aliorumque merorum opusculorum lingua Chin cheo seu una cum Grammatica & Lexico eius linguae* 與巴耶（Gottlieb Siegfried Bayer）的 *Museum Sinicum* (Petropoli, 1730) 作爲比較材料加以利用，不知爲何沒有提及 BL. Ms. Add. 25317。亨特文庫的中國關係蒐集品基本上是來自巴耶的，因此可以認爲上述拉丁語寫本原藏於巴耶之處。高田時雄「バイエル舊藏書のこと」，『人文』（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所報）38 號（1992 年）7~11 頁。而龍彼得又根據 *Museum Sinicum* 的 Praefatio, p.90 指出，爲巴耶將 Chincheo 文法自西班牙語翻譯爲拉丁語的是當時派駐於俄國的西班牙大使館的神職人員 Bernardo Ribera. Van der Loon, Pt.II, p.107.



而齊瑞諾的『漢西辭典』以同一種語言為對象，這也是不言自明的。這種語言是約 400 年前的閩南語。

作為其研究資料，以拉丁字母書寫的已在上文舉出，至於以漢字書寫的，上文提到的馬尼拉搖籃本之一的漢字本 *Doctrina Christiana* 是其代表，尚有明末的閩南語戲曲《荔鏡記》、《荔枝記》等書。齊瑞諾的『漢西辭典』給漢字加上拉丁字母的音標與西班牙語的譯詞，這種形式在研究方面顯然有許多便利之處。

關於該辭典所顯示的語言上的特徵，拙文篇幅已滿，無法具體討論。至於整個文本的轉寫與語言研究，擬另文討論，在此之前想先談談其書寫上引人注目的幾個問題。

首先，關於『漢西辭典』的漢字標記，可以看出以漢字書寫閩南語口語的傳統在當時已經確立，「值處」（哪裡）、「值時」（何時）、「值人」（誰）、「乜是」（甚麼）、「阮」（我們）、「伊」（他）、「只個」（這）、「許個」（那）、袂（不會）等都是這種用法。可以認為這顯示了齊瑞諾的中文教師喜好這種標記方式。

另一方面，拉丁字母標記呈現不同於其他資料的面貌。例如該辭典關於[k]完全不用 k-，全部寫成 c-或 qu-，這一點很顯眼，但最有特色的是乳 tzu、熱 tziet、日 tzit、仁 tzin 等，對於[dz]、[dʒ]使用 tz-的問題，這種寫法他書未見。並且不用 ng-，五 gou、願 goan 等均標記為 g-。又如相 xio 與相 sio 兩者所顯示的，在這個環境中 x-與 s-不加區別。當然與其他資料相同之處也很多，其中無聲音的出氣與無氣的區別對歐洲人來說看來很困難，該辭典也不加區別。關於韻母，對鼻化母音比較認真地標上了 v 的記號，這一點引人注目。

不過，要充分理解這部辭典，看來需要考慮到這種材料直接反映了教師與學生的學習的現狀。這不是一部用充裕的時間認真整理而成的辭典，因此頗有各種誤解原封不動未予訂正的情形。給詞語注音時也未必標出忠實於漢字的讀音。例如給「螢」標上 hue quim chee 的讀音，這顯然是表示「火金星」，乃是給西班牙語譯 *luciernega* (*luciernaga*) 填上 Sangley 語。「蟬」的 *yampou chee*（腌蛹蟬或蚌蛹蟬）也是如此。「雪」字標上 se 的音是不錯的，卻附上 *pedra*（石）的譯詞，這恐怕有誤，可能因音近而誤吧。而「霓」*gei* 後附有 *granizo*（雹）的譯詞也同樣不可理解，這種例子不少。但根據這些例子就斷定齊瑞諾的『漢西辭典』沒有價值的話，恐怕有些輕率。作為直接反映外國人學習語言現狀的材料，這部辭典是罕見的，如果我們將其作為語言接觸的標本重新定義，再度發現它的價值不是不可能的。考慮到這是距今 400 年以上的寫本，從各種意義上來說它都是彌足珍貴的，這一點無需贅言。

圖版出處

圖一：H. de la Costa, S.J., *The Jesuits in the Philippines*, 1967, Plate IV (A panel from Murillo Velarde's *Mapa hidrográfica*, 1734)

圖二：C.R. Boxer, *South 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1953, Plate VIII (From a Manila Ms. Of c 1590)

圖三：Biblioteca Angelica Mss. Fondo Antico 60

圖四：同上

2009
閩南文化
國際學術研討會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in-nan Culture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閩南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09 =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in-nan Culture, 2009 / 陳益源 主編.
——臺南市：
成大中文系, 民98.12
面：公分
ISBN 978-986-02-1885-5 (精裝)
1. 中國文化 2. 臺灣文化 3. 文集
630.7 98024334

2009閩南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in-nan Culture

出版單位：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金門縣文化局
主辦單位：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金門縣文化局
合辦單位：國立金門技術學院閩南文化研究所、台南市政府文化觀光處
協辦單位：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中國民俗學會、
台灣敘事學學會、金門縣金門學研究會
補助單位：國立成功大學邁向頂尖大學計畫推動總中心、
國立成功大學文學院、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主 編：陳益源
執行編輯：史欣儀、黃寶慧、廖凱蘋
文字編輯：李淑如、羅景文、莊秋君、李吟臻、邱彩韻、陶靜、
吳沂濤、陳涵書、傅筱婷、張書容
美術編輯：陳怡君、柴盈
行政指導：李錫隆
行政支援：楊加順
行政人員：郭朝暉、曾淑鈴
封面設計：曾憶如
排版印刷：禾順彩色印刷製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年月：98年12月
定 價：新台幣600元
I S B N：978-986-02-1885-5